

中外历史知识专题讲座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历史教研室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外历史知识专题讲座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历史教研室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100号

中外历史知识专题讲座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历史教研室编

责任编辑: 崔永琳

封面设计: 藏 洪

责任校对: 魏晓玲

版式设计: 任志珍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址: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编: 100091 电话: 258.2931 258.1868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32开

版次: 1992年3月第1版

字数: 225千字

印次: 1992年3月第1次

印张: 8.75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5035-0678-4/K·41

定价: 4.80 元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前 言

本书是中央党校高中级干部选修课中文史知识讲座的部分教材。多年来，这门课深受学员欢迎，有助于我们的干部以史为鉴，紧密联系现状和历史，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了满足本校和各级党校、干部学校广大干部学习中外历史的需要，我们蒐集了涉及古今中外历史的17个专题编印成册，以飨更多的读者。

《中外历史知识专题讲座》的各个专题均由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的主讲教师执笔编写，最后由何承艰同志审定。中央党校出版社给予大力支持，在此致以谢意。

编 者

1992年5月

目 录

西汉王朝政治得失的历史启示·····	王子今 (1)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丁柏传 (17)
《资治通鉴》中的政治策略·····	岑大利 (36)
今古文经学的历史渊源·····	崔新民 (52)
天国兴亡史鉴·····	费福容 (70)
戊戌维新政鉴·····	范士华 (87)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建设的经验教训·····	胡盛芳 (105)
孙中山的治国思想·····	赵书刚 (122)
北洋军阀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曹贵民 (140)
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其特点·····	史远芹 (157)
佛教及其在中国·····	祖佳音 (175)
彼得一世及其改革·····	李 玥 (190)
俾斯麦与近代德国的统一·····	陈景彪 (206)
日本明治维新·····	李 玥 (214)
美国两党制的历史和现状·····	牛伟宏 (231)
浅析近代法、德、美、俄四国工业革命的 进程与特点·····	杨 云 (2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	何承艰 (260)

西汉王朝政治得失的历史启示

王 子 今

自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至公元8年（孺子婴初始元年）王莽代汉，西汉王朝历经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十三代的统治，达210年。如果从公元前206年刘邦封汉王起计，又依照将王莽新朝15年的历史也归入西汉史一并叙述的一般通例，则西汉历史长达230年。西汉帝国作为当时与古罗马帝国东西遥遥相对的大一统专制主义政权，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西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时期。秦短促而亡，西汉王朝是承袭秦的制度而实现成功的统治达二百余年的第一个专制主义王朝，在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文化政策、军事制度诸方面，都大致规定了此后二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格局。此后政权有嬗替，制度有演变，经济有发展，文化有进步，但是基本的社会特征长期没有发生突出的质的变化。甚至可以说，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基本经济结构的主体仍大致依然如初。具体地说，这一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时期之所以对此后漫长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西汉史的研究对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史有特殊意义，在于这一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确立，专制制度的特点得以形成，文化思想的统一得以实现，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也已经显示出来。

历代历史学家和重视借鉴历史经验的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十分

注意西汉王朝盛衰的历史教训。司马迁著《史记》，就是希望像孔子作《春秋》那样，传给“后世圣人君子”。《史记》有关西汉的内容是司马迁所写的当代史，其中除敢于用直笔记录当权者的暴虐和愚昧外，还以“太史公曰”的形式直接陈述自己对史事和时政的分析。司马迁的追求，据他自己说，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索出某些规律性的认识。东汉初年班固等所撰《汉书》，是记叙西汉兴亡的第一部断代史，是又一部研究西汉历史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史籍。《汉书》在各卷卷末也有所谓“赞”，并在全书最后专辟《叙传》一卷进行总结，陈说自己对西汉历史的评价。《汉书》在成书后不久，就已经受到东汉社会上层的重视。东汉大经学家马融，就曾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三国志·吴书·孙登传》记载，孙权令长子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当时江东名士张昭教授《汉书》，孙权为避免张昭烦劳，特意派张休就读于张昭门下，再转授给孙登。司马光编辑《资治通鉴》尽管持略古详今的原则，但西汉二百余年历史仍在294卷篇幅中占30卷。与战国及东汉、魏晋南北朝等历史阶段比较，显然作者更看重西汉史。司马光编写史书，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著生民之休戚”，即记载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二是“叙国家之兴衰”，即叙述历代王朝统治的经验和教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史论，其本人撰写，标识为“臣光曰”者计118篇，转录前人评论计97篇，共计215篇。而关于西汉一代可见“臣光曰”27篇，转录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班彪、荀悦、李德裕等人的评论25篇，总计52篇，占《资治通鉴》中史论总篇数的近1/4，远远超出纪事部分所占篇幅的比例（1/10）。唐刘知几著《史通》、明李贽著《史纲评要》、明清之际顾炎武著《日知录》、王夫之著《读通鉴论》等重要史学专著，也都特别注重西汉历史的总结。可见，历代政治家和史学家都早已注意到西汉一朝在中国古代史中的概括特点和典型意义。

秦始皇削平六国，实现了统一。然而不过十数年，秦帝国就在人民起义浪潮的冲击下归于覆灭。刘邦是起义军领袖之一，他较陈胜、吴广、项羽更有政治才能，终于在公元前 202 年击败主要对手项羽后建立了西汉帝国。

西汉前期实行无为政治，使人民在激烈战乱之后得到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这对于中央政权的巩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民期求安定和平，中央政权因此能够消灭异姓王，又削灭七个割据的同姓王，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汉高祖刘邦在位七年，他规定与民休息的政治方针，为西汉王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惠帝以至文景时代，仍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方针。当时黄老之学在政治上居于指导地位。这种思想既反对儒学的“繁礼”，也批判商鞅、韩非极端专制主义的“重法”，主张“无为无不为”。汉惠帝奖励人口增殖与土地开垦，规定民女超过 30 岁不嫁，要付罚款，又规定辛勤致力农耕的“力田”人可以免除终身劳役。汉文帝是著名节俭的皇帝，他亲耕藉田，提倡农耕，多次免除天下农田租税。汉景帝即位，收民田半租。汉高祖定租率为十五税一，半租是三十税一，确实是很轻的租税。这一制度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流亡民户逐渐回归于政府控制之下，大片荒地开垦出来。由于自耕农数量的增加，直接向政府缴纳的租税数量也有所保证，这成为西汉前期社会繁荣的主要原因。文景时代于是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俟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社会

安定富足，西汉王朝的国力也空前强盛。

汉武帝时进一步削弱了王国势力，并通过削减相权、充实中央军力、设置刺史、统一货币、盐铁官营等方式，加强了中央集权政治。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到武帝时，全国才实现了真正的统一。汉武帝凭借前代积累的财富，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例如开凿道路和开发水利）。汉武帝时代成为西汉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而同时人民付出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国内社会矛盾开始激化。汉武帝晚年觉察到政治危机的严重，他颁布轮台之诏，实现了政策转变，保证了“昭宣中兴”政治局面形成的条件。《汉书·食货志》说：“至昭宣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宣帝即位，……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就在西汉极盛期达到顶点时，又渐渐转入了衰亡时期。

汉宣帝曾教训汉元帝说，我们汉家的制度，一向杂用霸道（刑名之学）和王道（儒学），怎么能够仿效西周政治用纯儒学呢！乱我汉家制度的必定是你了！汉末纯儒学政治的盛行，正是中央集权衰弱，豪强割据势力兴起的反映。当时贵族官僚盛行兼并，与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一起，同中央政权争夺剥削农民的权利。农民于是往往受到几重压迫。鲍宣上书汉哀帝时曾指出，当时农民有七种灾难：水旱天灾、横征暴敛、官吏侵夺、豪强兼并、徭役繁多、乡吏扰民、盗贼掠夺。除七种灾难而外，又有七条死路：官吏残杀、刑罚苛毒、冤狱陷害、盗贼横行、报怨寻仇、饥饿无救、时疫流行。作为社会主要生产力量的农民辛苦劳作仍不得温饱，甚至生存也得不到保证，时时面临死亡或沦为奴隶的危险。在如此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前，西汉王朝力图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以挽救危机。汉哀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下诏令限制诸侯王、列侯、公主、大官僚及豪富民奴婢、田宅的数量。然而实际上并不能实行。儒子婴初始元年（公元8年），在社会危机日益显著的形势下，王莽在一片拥戴声中代汉

自立，随即推行一系列新的政策。其中有的根本不可能实行，有的不仅不能解决原有的矛盾，反而造成了新的矛盾。政府强制推行不可能成功的政策，又无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终于激起了剧烈的社会动乱。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军推翻了王莽的统治，同时形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刘秀进行了十余年的战争，才一一铲平割据势力，重新实现了统一，建立了东汉王朝。

三

对西汉王朝何以能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设起空前强盛的帝国，继而又由盛而衰，最终归于覆灭，由于立论者的立场、观点不同，历来有不同的认识。因为目前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尚未形成趋于一致的认识，对于可以称作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年历史的一个标本的西汉历史的分析，也很难有权威性的结论。但是人们稍加思索就可以发现，西汉一代，直至王莽时代社会大动乱爆发前夕，社会经济始终处于发展的进程中。在一般认为昭宣之后以至西汉末世的元成哀平时代，西汉政府控制的人口数字达到顶峰。而户口是标示封建王朝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数。据史书记载，“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①“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哀帝时，“宫室苑囿府库之藏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②在社会经济上升的阶段为什么又出现波动，以致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大动乱呢？有的同志指出，动乱的爆发，在于官僚政治干预经济，政治危机导致经济生活的彻底混乱，这种意见，可能较为接近历史真实。总之，社会矛盾，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交叉运动所形成的历史的合

①《汉书·王褒传》。

②《汉书·食货志》。

力，推动汉家王朝由盛而衰，又走向覆灭。中央政权的决策人如何最大限度地因势利导，调整阶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经济，巩固政权，通过西汉一代的历史，考察这种努力的成功与失败，足以为后世政治家提供经验和鉴戒。

讨论西汉王朝盛衰的原因，我们不妨着重分析其统治政策积极的成功的一面。纵观西汉历史，大致在其鼎盛时期，主要有这样几项方针政策表现出突出的效能：〈1〉顺流更始；〈2〉清静无为；〈3〉劝民耕桑；〈4〉翦除豪强；〈5〉整肃官司。然而在执行时逐渐或有歪曲，或有殆懈，或走向反面，于是又往往成为政权衰落的原因。

1. 顺流更始

《史记·萧相国世家》评价萧何事迹，称赞他“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更始”，也就是改革、革新。这里是说西汉王朝上层集团重视秦亡的历史教训，在承袭秦制度的同时，对其弊端断然加以革除。“民之疾秦法”，即秦法严酷，激起民众的仇恨与反抗。以刘邦为首的新的统治集团顺应民心，特别注意约法省禁。入关后，首先约法三章，削除秦时烦苛之法，赢得关中民众的拥护。此后萧何作《九章律》，孝惠、高后时“刑罚用稀”。文帝时除肉刑，景帝时规定笞刑的规格和数量。一时上下守法，实现了政宽人和的局面。

而至武帝以后，刑罚繁复，禁网渐密，律令多达 359 章，大辟罪就有 409 条、1882 事，死罪决事比 13472 事。法律文书堆满了官府的几阁，主持政法的人也不能全部通读。奸人酷吏乘机循私弄法，一时冤狱遍于国中。宣帝时郑昌建议删定律令，然而没有来得及实行。成帝时，大辟之刑已达一千多条，律令烦多，达一百余万言，律令之外附加的内容更日益增多，专门研究律令的人也难以知道其根据，百姓更是无所适从。在这种黑暗压迫之下，人民不得不起而反抗。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的另一重要例证，是帝王警惕秦始皇、秦二世专断误国的危害，比较能够接受正确的意见，基本能够清明守法。刘邦定都长安，是接受戍卒娄敬的建议。刘邦曾立赵王如意为太子，也为朝臣所劝止。周昌曾入奏事，恰逢刘邦拥戚姬而宴饮，周昌还身而走。刘邦追上来，骑在周昌脖子上问：“你说我是何等样的君主？”周昌仰面回答：“陛下是桀纣一般的君主！”刘邦笑而不加之罪。汉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人突然从桥下走出，帝车马惊，逮捕交廷尉张释之治罪。张释之判定违犯道路戒严之令，当罚金。文帝大怒，以为处罚过轻。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廷尉判罪稍有偏颇就会影响天下用法之轻重，百姓将何所措其手足？”事后，文帝承认张释之的处理意见是正确的。有人偷盗高帝庙座前玉环，文帝震怒，逮捕后交廷尉治罪。张释之按照法律条文判定当“弃市”。文帝大怒说：“交给你治罪，是要让你判为‘族’（刑及父母妻子），为什么只是依照法律条文定罪呢？”张释之坚持“法如是足也”，一定要依法定罪，最终文帝也不得不表示赞同。

秦时“宫室过度，奢欲亡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①终于导致灭亡的教训，汉初统治者记忆犹新。在经济恢复阶段，天子用车不能驾一种毛色的马，而将相有的乘坐牛车，社会上层的生活消费也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汉文帝尤其节俭，即位23年来，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曾经规划在宫中修造露台，召工匠作预算，知道需花费百金，文帝说：百金相当于中等农户十家的产业，我住在先帝的宫室里，常感到惶恐惭愧，为什么还要修建新的台呢！文帝常常穿用朴素的绋衣，规定所爱幸的慎夫人衣不得曳地，帟帐也不许刺绣图案花纹。在遭受天灾时，命令放松山泽之禁，减免出行仪仗和日常服用的器物，精减官吏，开发仓庾，

^①《汉书·晁错传》。

以救济贫民。修建陵墓，不大兴土木，随葬只用陶器。不许以金银铜锡作装饰，希望俭省，不致烦扰民众。最高统治者率先提倡节俭，限制消费，客观上减轻了生产者的负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西汉中期以后，统治者“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①。许多富家“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②。奢侈逸豫，形成世俗，“秦奢亡度，穷困百姓”^③。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

2. 清静无为

汉初崇奉黄老之学，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方针。当时，要求安定与和平是整个社会共同的呼声。甚至儒家代表人物如陆贾，也在《新语》一书中提出：“夫道莫大于无为。”黄老之学主张“无为无不为”，就是在政治措施上少有举措，避免苛烦扰民，使经济自然发展，最终实现国固邦宁的理想局面。汉初这种政策的理论原则集中体现于《淮南子》一书。《淮南子》说：“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原道》）在阐述“无为无不为”的理论时，突出强调了“因循”和“待时”的思想。所谓“因循”，就是顺应一定的规律，从其自然。所谓“待时”，就是因时制宜，不急时争利。书中强调应当“除苛削之法，去烦苛之事”（《览冥》），“上无苛令，官无烦治”（《齐俗》），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显然，这是一种达到很高境界的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汉初认真地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汉高祖刘邦规定：“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④，不向

①《春秋繁露·度制》。

②《盐铁论·刺权》。

③《汉书·鲍宣传》。

④《汉书·食货志》。

百姓额外多加盘剥。汉高祖五年，下令对功臣“复其身及户，勿事”，即免除劳役。七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八年，“令吏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十一年“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①。与民休息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兵役及徭役的减轻。汉惠帝四年，“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②。一般民众的徭役也不很重。在刘邦称帝十年之后，才开始修筑首都长安的城墙，进行如此重要的工程，也只在农闲时征发百姓，每次不过三十日，继续施工三年方才完成。汉初对农民还多次减免田租。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说：当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农民能够安心生产，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萧何是制定和推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政策的卓越的政治家。萧何去世后，曹参继承其事业，“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他决心执行刘邦与萧何制定的清静无为的政策，“遵而勿失”。他专门在郡国官员中选拔“木拙于文辞”的“重厚长者”，以为自己的助手。郡下有言辞激进，力求搏取个人声名者，就立即斥退。曹参任汉相国达三年，“天下俱称之美”，百姓歌颂道：“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以清静，民以宁一。”^③由于实行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又保持了这一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而保证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随着西汉帝国的强盛和统治阶级力量的上升，统治者必然要求强化和集中权力，征调民力为自己争得更多的利益。到了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执政的时代，转而实行多欲而有为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①《汉书·高帝纪》。

②《汉书·惠帝纪》。

③《史记·曹相国世家》。

3. 劝民耕桑

西汉历届政府都比较重视农耕，尤以西汉前期对重农政策推行最力。所谓“农，天下之本也”^①，“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②，体现出当时对农业的特别重视。文景时代，皇帝常常亲自率耕藉田，为天下先。在基层政权中按户口比例推举努力农耕的人任“力田”官。必要时还向农民“贷种、食”，减免租税，遇灾荒则“发仓庾以振民”。汉武帝元狩三年“遣谒者劝有灾郡种宿麦”^③，元鼎六年“令吏民勉农，尽地力，平徭行水，勿使失时”^④。成帝阳朔四年，“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命令各郡太守一级高级地方官员亲自赴田间督察生产）^⑤。汜胜之任轻车使者曾“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⑥。平帝时，“置大司农六郡丞，劝课农桑”^⑦。按照制度，组织与督察农业生产，是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只是到了西汉末期，由于政府机能的衰退，已常常不能有效地组织生产，政府往往单纯成为聚敛财富的工具。逢灾荒时，由于政府不能成功地组织救灾恤农，恢复生产，也成为导致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西汉社会是一面明镜，可以反映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那么汉武帝时代如同一块镜片，从中也可以看到某些对于认识历史规律富于启示性的现象。汉武帝即位后不久，就组织开通漕渠，自昆明湖至黄河，节省了漕运时间，并灌溉渠下民田万余顷。其后又开通河汾渠、龙首渠、六辅渠、灵轵渠等。元封二年，亲率百官和士卒数万人塞黄河瓠子决口。此后，在朔方、西

①《汉书·景帝纪》。

②《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武帝纪》。

④《汉书·沟洫志》。

⑤《汉书·成帝纪》。

⑥《晋书·食货志》。

⑦《后汉书·卓茂传》。

河、张掖、酒泉等地也兴修水利，开渠灌田。汝南、九江、东海、泰山等郡也都修建了较大的水利工程。汉武帝重视发展水利，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汉武帝政治的另一面，是“辟地广境”、“军旅数发”，“南伐百越，北讨强胡，西征大宛，东并朝鲜”，农民承受着徭役和兵役的沉重压力，又不堪忍受日益加重的经济剥削，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在社会危机逐渐严重的背景下，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了“巫蛊之祸”这一著名的政治事件。卫太子刘据与汉武帝政见多有不同，主张推行宽容温厚的执政方针。武帝信用并赋予特别权力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利用这一矛盾，制造了太子宫埋木人行巫蛊的冤案。刘据愤而起兵杀江充，与政府军战于长安市中，后兵败东逃，在追捕中自杀。事变之后，汉武帝有所悔悟。征和三年，汉军西征失利，汉武帝利用这一时机开始了政策的转变。征和四年，颁布著名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否定桑弘羊等人继续致力经营西域的请求，不复出军，并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创代田法，又创制了新农具耧犁和耧车等，代田法和新农具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实现了新的进步，“用力少而得谷多”。于是，政策方针急剧转变为“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汉武帝颁布轮台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挽回颓势、收取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由此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政治秩序，使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重新成为政府行政的重心，于是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乎！”^①所谓“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包含有重视农耕的意义。汉武帝终于在最后一两年完成了政策转变，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他敢于承认自己“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能全力挽回局势，确实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4. 铲除豪强

地主势力上升，一般通过作官致富，或经商放债，往往用暴力掠夺农民，成为地方恶霸，当时称作豪强。郡县乡里都有大小豪强。大豪强独霸一方，兼并贫弱，使农民苦不堪生，也减少了中央政府的正常收入。西汉初年，对具有雄厚经济实力、专横地方的豪强持强硬的态度。政府采取与秦王朝近似的政策，大规模迁徙豪族富民充实关中诸陵邑。秦时徙民政策主要针对关东人，汉时对关中富户也基本同样看待，因此较秦时更为彻底。这种强制徙民政策，打击了富豪，摧毁了原有的牢固的宗法关系，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也使当地农民的反抗情绪得以缓和。

汉武帝以后，豪强势力进一步增长，而且出现了皇族、功臣之后及官僚阶级与豪强合流的趋势。政府一方面委派强硬严厉的地方官以抑制和打击豪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实行较为宽弛的政策。昭帝始元三年，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始元四年，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②。宣帝本始元年，“募郡国吏民贫百万以上徙平陵”^③。强制徙民改变为“募徙”，迁徙的代价由起先仅仅为“复”，即免除一定时间的劳役，改变为“赐钱田宅”。汉元帝永元四年，诏令“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居乐业，亡有动摇之心”。至此大规模移民运动宣告结束。徙民，只是打击豪强的政策之一，以此为例，由强迫迁徙到自愿应募又到“勿置

①《资治通鉴》卷22。

②《汉书·昭帝纪》。

③《汉书·宣帝纪》。